

文坛观察  
WENTANGUANCHA

# 城市文学应抓住城市的精神内涵

□ 杪 穆

在近几年的文学现场，“城市文学”作为一个话题保持了较高热度。在中国，虽然乡土文学的地位远甚于城市文学，但后者并非没有历史传统。从广义上论，《诗经》中诸如“出其东门，有女如云”（《邶风·出其东门》）、“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颂·殷武》）等诗句对城的记载，以及诸子散文对孔子、孟子等出入都邑的描述，都可看作是城市文学的雏形。由此，古代城市文学的脉络一直绵延至明清小说，其由少而多、由浅入深的轨迹清晰可见。当然，这与城市和城市生活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近现代以来，伴随“西风东渐”，率先在沿海地区以及南方，现代意义的城市生活在古老的中国孕育而生，城市文学获得了新的特质，并逐渐蓄势成为当下最活跃的创作领域之一。以时间为坐标来观察，城市文学可以分为古代城市文学和现代城市文学两个类别——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又不仅仅是历史的先后顺序，而是古代和现代城市文化精神的不同。

通俗而言，城市文学是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写作。但，这其中“人”才是城市文学的灵魂，城市不是主体，而是客体或“他者”。从人出发，城市文学中的“城市”主要作为生存环境被描摹、想象和建构。就写作者的视角来看，将城市本身作为题材的散文和非虚构作品往往把城市历史、生活和风物作为审美的对象。古代班固的《两都赋》、左思的《三都赋》，现代如老舍的《想北平》《北京的春节》，当代素牧的散文《花城》等都是这类作

品中的典范之作。邱华栋的《北京传》则是近年来城市文学中的新收获，而2004年吕林编写的《小镇：精神魏玛》，以文学手法正面为一座城镇立传。与此相似的还有林那北写福州“坊”与“巷”的《三坊七巷》。这种把目光聚焦于一个地理所在的写作，不禁让人想到埃米尔·路德维希的《尼罗河传》以及徐刚的自然文学名作《地球传》。在从古至今的审美脉络中，城市获得了与自然地理同样的客体地位，写作者是把城市当作精神家园的形象来刻画的。

除了将城市本身作为主要观察和审美对象之外，大部分城市文学作品以城市为活动地理和历史空间背景，这主要表现在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文学中。在农耕文明时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农村，城市作为比农村发达一些的生活场所频繁出现在文学描写和想象中，铁凝的《哦，香雪》、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远在农村之外的城市发达的物质条件和文明生活代表了现代社会新的发展愿景，这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农村的流传一样，都是一个时代的观念象征。在这些作品中，城市及其生活方式是人们所憧憬的美好生活所系。城市文学的另一个角度是对都市生活及其价值的批判，这也是一个传统主题，从沈从文及其以前的作家就开始了，沈从文的《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知识》等作品皆是此例。伴随城镇化步伐加快，特别是大部分人口转移到城市生活之后，这一主题不断被张扬。值得注意的是，对城市的批判常常是写作者站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立场上来进行的，代表着社会发展与传统与现代两种力量的角力。

尽管一些城市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城市元素，但是从文化基础上来说，无论是向往还是批判的视角，城市作为与乡村相对的“他者”，这些作品很难说抓住了城市文化精神的本质。现代城市文学的特质是将城市生活作为审美客体，以城市与人的关系作为基本伦理，写出城市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和给人的命运带来的影响。上海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化发育最为充分的超大城市，金宇澄的《繁花》表现“宏大历史下小人物随波逐流的命运无常的无奈”，而凭借独特的沪上方言、群像式的人物、传统的海派风情的书写，通过“对上海普通民众和饮食男女的重新建构”，呈现了“上海与上海人”的独特文化关系。这种以城市历史为背景的写作，不仅使小说具有了坚实的叙事基础，更以文学的方式为上海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再往前追溯，范小青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裤裆巷风流记》则通过生动的苏州方言讲述发生在小巷子里的人情琐事，对苏州这座古城的风貌进行了艺术观照。从城市的角度观察，这些作品写出了城与人的不可分离性，离开那座具体的城市，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将不复存在，这似乎也可以作为评价城市文学的某种标准。

城市生活对青年一代的影响远大于前辈，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在人身上逐渐加深的城市印记。以对北京的书写来看，在老舍、刘绍棠、王朔等“京味儿”作品对北京的朴素呈现之后，年轻作者笔下的北京深刻改变着人物的精神世界。徐则臣以外来者的身份观察和体验北京，以北京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塑造了一批怀揣理想到北京打拼，历经艰难却不得不面对

失败的小人物形象。卖盗版盘的敦煌（《跑步穿过中关村》）、办假证的边红旗（《啊，北京》）、与朋友合伙经营小书店的王一丁（《西夏》）等，这些身处边缘的人物无疑代表着北京的另外一种真实，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象征。石一枫是在“北京大院”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被称作塑造了“城市新人”的形象，主角陈金芳从乡下转学来到北京，进入社会后新的生活重塑了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成长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品投资商后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最终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幢公寓楼里自杀未遂。在“成功哲学”畸形价值的引导下，人物自我膨胀后迷失了人生方向，在陈金芳身上同时显现着城市作为“天堂”和“人间”的不同属性。

在当下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中，与乡村书写的对比是一个路径，有研究者认为应当在与乡土文学“对位”的意义上讨论城市文学。城市书写与乡村书写之间的重大区别，还在于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生长性。由于大规模建设和设施更新，在大部分新生的城市中，以建筑、风物、市井生活方式等为依托的文化精神，还不足以形成稳定的文化力量来影响人的心理情感，这也就是为什么相对成功的城市文学作品，其地理空间绝大部分在一些既有历史传统又有城市内涵的地方。对城市的书写耽于对表象的关注，而缺乏对城市精神的挖掘，这是当前城市文学创作中的欠缺之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书写的价值。与此不同，成功的乡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总是从他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精神中获得生机，这应当成为城市书写可借鉴的经验。



□ 张占杰

今年是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由宋曙光策划、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我与孙犁”丛书的出版，是众多纪念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丛书共五册，包括再难舟《欣慰的回顾》、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耕堂闻见集》、宋曙光《忆前孙犁》。多年来，人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忘记孙犁，对孙犁的缅怀，正逐渐走向对其人品、作品深层次的认识，认真总结、研究他的文艺思想、编辑思想，细读他的作品，探幽掘微，以资借鉴。这套丛书是20年间纪念文章的精选和新作的集合，披露了大量新鲜史料，展示了作者对孙犁作品的真见。丛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纪念”的范畴。

丛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将深情回忆与对孙犁的阅读结合起来，以大量一手资料，用丰富的细节为读者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孙犁。宋曙光18岁参加工作，任职天津日报文艺部，职业生涯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文艺周刊》的复刊。在《忆前孙犁》以及《报纸上的芳香》等文中，围绕《文艺周刊》复刊，他以亲身见闻，细致描绘了孙犁晚年生活的另一种场景。尽管已经离休，孙犁依然关注着《文艺周刊》的发展，尽其所能提供帮助。谢大光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参与编辑了《孙犁文集》《孙犁散文选》等著作。在《孙犁教我当编辑》中，他结合与孙犁共同编辑几本重要文集的过程，认真体味了孙犁提出的“编辑也要有自己的个性”，重视“选家的眼光”的思想。作者将对孙犁的感情融入感性的叙述与认真的理论总结之中，这是在孙犁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文艺编辑对孙犁最好的纪念。

丛书提供的最重要的史料莫过于肖复兴、卫建民、再难舟等人披露的孙犁佚信。此次刊载的孙犁写给卫建民的62封信，有45封是首次披露。肖复兴在书中专辟一辑，刊载了20封孙犁的信，其中15封是首次披露，同时，他还附上了自己当时给孙犁的信，使读者对二人通信的前因后果有一个全面了解。再难舟披露的两封20世纪70年代孙犁的信值得重视。第一封写于1971年，是孙犁从五千七校回到单位后，在文艺部做见习编辑时给再难舟写的约稿信，类似于公文，没有太多私人情感，它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当时的孙犁认真但又了无趣味的工作状态；另一封写于1973年，是孙犁收到再难舟保存的《风云初记》等手稿的回信，除了表达感谢，还介绍了近期身体、工作情况，以及对韩映山新作的看法。此信虽短，但信息量大，字里行间呈现了孙犁当时真实的精神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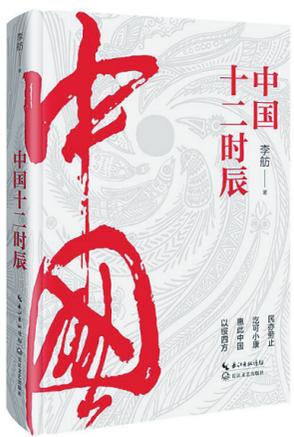
丛书的各位作者也是孙犁研究的专家。宋曙光通过查阅档案和电话采访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亲属，写就《幸存的调查》，梳理了郭小川、方纪、孙犁在1949年《文艺周刊》创办过程中各自的情况。这一“调查”，与孙犁自己的回忆以及报社总编石坚的文章一起，澄清了坊间许多不实说法。谢大光在与孙犁聊天时，听晚年的孙犁详细回忆往事，最终整理出《听孙犁谈童年》《听孙犁谈母亲》两篇文章，细节动人，极具历史感，是有关孙犁早年生活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孙犁研究队伍除了“学院派”外，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当代作家，如铁凝、贾平凹、莫言等人。他们早年受孙犁推荐，得以快速进入当代文坛，成名之后，在回顾写作生涯时，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孙犁的影响，在日常阅读中，也会有意识地以自己的写作经验出发，认真研读孙犁的作品，发人所未发。如贾平凹的《孙犁论》中提出的“孙犁是一个大儒”的观点，一些专业评论、研究都难望其项背。

肖复兴也是研究孙犁的当代作家中的一员。孙犁去世后，他“几乎每年写一篇读书记”。《清风犁破三千纸》共两辑，其中一辑便是“读书记”。肖复兴从自己的写作经验、人生阅历出发，对孙犁的代表作品，进行了独到解读。例如，对孙犁名作《铁木前传》，他从文本结构内部出发，指出：“读这部小说，如同剥笋，最外面的一层是农村合作化；中间一层是时代巨大变迁中友情和爱情的失落；最内的一层是人际关系的变化和个人的触及。”在这样的结构中，主人公的位置随着小说行进中层次的不深入而发生转换，由铁木二匠，转到小满儿身上。小满儿的形象，已经脱离了当时文学的人物谱系，“以往形成定势的经典模式的叙述和描写中，满儿以青春和人性质疑并还原生活的内在矛盾，其人物塑造的修辞方式，还面临挑战。既然无力回天，又无意追风逐浪，不能去做当时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一样观念性的直白呼喊，那么索性戛然而止，也是一种写作姿态的选择”。这些观点醍醐灌顶，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作家才能如此选择解读的角度，对作品的内在肌理了解得如此透彻。

## 多维度展现孙犁形象与精神 ——『我与孙犁』丛书评析

## 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壮美画卷 ——李舫散文《中国十二时辰》赏析



□ 李恒昌

早在两千多年前，《诗经》就有“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礼记·礼运》描绘了“小康”理想社会状态，反映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今，这一梦想在中国大地变为现实——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李舫新著《中国十二时辰》（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以脱贫攻坚为主线，以中国传统的十二时辰计时方式和顺序为节点，缕述十二个城市下辖乡村的

脱贫故事，全景式展现了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

该书结构独特。作者将飞驰的中国浓缩在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中，将中国大地上的十二个地点连接为面，构筑起一个独特而广阔的时空舞台，增强了叙事的历史纵深感与现实辽阔感。透过一天中的光阴变化，人们得以走进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在四川，悬崖村的峭壁上，17条藤梯、2556级钢梯的痕迹还清晰可见。然而，这里已不是过去那样闭塞的小山村，而是一个面向世界、拥抱世界的彝族村寨。在宁夏，记载中国历史光辉篇章、伴随着中国革命奋进征程的革命老区，一代又一代西海固人艰难探索，终于彻底摘掉了“苦瘠甲天下”的穷帽子，迎来了胜利曙光。在湖南，十八洞村村民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十六字方针彻底摆脱了贫困，迎来了山乡巨变。在广西，白桦瑶从深山走出来，开始建设新的家园。在这里，他们一边传承白桦瑶古朴、独特的文化，一边拥抱新时代的新生活，崭新的日子正如山里的朝阳。在浙江，曾经频繁迁徙的畲族“山哈”，早已摆脱了身份认同的尴尬，他们在景宁这片山地中扎下根来，心中是满满的幸福。在贵州，现代文学让平塘知道了大山外面的世界，也让大山外面的世界越来越了解平塘，知道平塘不仅仅有“中国天眼”，还有“中国天坑”和“中国天书”。这一天，是中国无比丰盈的一天。在这十二时辰里，有着数不清的人间奇迹：不论是雪域高原的昌都、悬崖峭壁的凉山，还是苦瘠天下的固原、武陵河畔的湘西；

不论是“中国天眼”的平塘、七省通衢的襄阳，还是洞宫山间的景宁、赤水河畔的南丹……全面小康照耀的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这是“民族团结，欣欣向荣”的脱贫攻坚史诗。作品不仅结构独具匠心，对于十二个脱贫攻坚战场的选择也颇费心思。它们都属于脱贫攻坚的重点或代表性地区，有些还是少数民族居住区。这是五十六个民族携手并肩，团结一致，共同前进，“一个也不落下”的脱贫攻坚。在宁夏西海固，我们窥见回族同胞的不懈追寻；在四川大凉山，我们领略彝族同胞的华丽转身；在湘西十八洞村，我们看到苗族群众如何旧貌换新颜；在浙江丽水市，我们看到景宁畲族自治县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走出一条共同繁荣发展的致富之路。

摆脱贫困，是中国人期待千年的梦想，也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难题。该书在抒写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不仅艺术地再现了脱贫攻坚过程中生动的故事和感人的细节，而且通过讲述不同地区脱贫攻坚的故事，梳理了破解这一难题的做法。

作者既是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的见证者、记录者，同时也是思考者。对于不同地区的扶贫方式，作者进行了梳理。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们看到了思想扶贫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作者突出了两个关键词——“驱鬼”和“觉醒”。“驱鬼”就是驱除愚昧、落后、贫穷

的“鬼”。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正是因为“我们觉醒了”，才让昔日深度贫困的三岔河乡旧貌换新颜。

在四川壤塘，作者通过抒写阿坝州、壤塘县联合当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开办第一个公益非遗传习机构——壤塘非遗传习所，将具有千年历史传承的绘画技艺传授给当地青少年，从而见证文化扶贫的巨大潜力。

在宁夏西海固，移民政策的逐步实施，异地移民搬迁、城区搬迁、危房改造措施的落实，使得贫困户全部脱贫，从而证明生态扶贫的作用。

在吉林大安，潘修强带领他的团队，将基地扎根于此，从智慧农业入手，开启了对盐碱地的持续改良和修复，昔日的盐碱滩变成了“米粮川”，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彰显了科技脱贫的魅力。

在广西南丹，为扶贫搬迁安置工程配套建设的里湖瑶族乡王尚小学有着丰富的教学楼、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课程。校长覃玉先将他的工作分成三部分：传统教学、民族文化遗产、利用社会各界关爱开展感恩教育活动，发挥了教育扶贫的作用。

在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风景中，在全面小康照耀的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这些脱贫攻坚战中的动人故事，创造了了不起的人间奇迹，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 人物与文本的双向解读 ——评刘建东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

□ 于 泉

在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中，作者刘建东以“董仙生”这一虚构人物为核心，将他的人生际遇贯穿其中，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困境。他笔下“董仙生”的人物性格层次鲜明、极具纵深，成功地作为系列小说的支点，支撑起了作者庞大的叙事野心。

以人物为中心贯穿叙事是长篇小说的基本辨识特征，刘建东将这种模式套用于中短篇小说系列中的尝试显得相当大胆。他对“董仙生”人物的塑造手法，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格列佛游记》中的格列佛，或是《人间喜剧》中的拉斯蒂涅。董仙生十余篇系列小说之间产生关联的方式类似《格列佛游记》，而作者在其中试图展现的核心内容却与《人间喜剧》更加相近，刘建东塑造“董仙生”的方式更像是游离在两者之间。

《格列佛游记》是一篇游记小说，在叙事的优先级中，斯威夫特对社会现象的关注要远高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独立人物存在的格列佛，形象相对单一、固定。而《人间喜剧》则是中短篇小说合集，其中多次“复现”的拉斯蒂涅是巴尔扎克重点着力的人物之一。在当下的语境中，两者可能并无进行比较的必要和价值。而在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中，刘建东以游记的形式，进行了一次颇为成

功的孤立“人物复现”实验。游记的形式自由、边界宽广，为“董仙生”的塑造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可能，而在“复现”的叙事节奏中，他的人物形象也层层堆叠，逐渐明朗。

在这部小说集中，《丹麦奶糖》《相见不难》《甘草之味》《走失的人》《嗨咯》几篇作品的观察视角和叙事角度差异很大，“董仙生”的年龄、职位、心态在其中也颇为不同。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是主人公、是核心视角所在，而在部分小说中，他也可以作为“不重要”的参与者出现，拓宽小说的叙事维度。比如在《嗨咯》中，他作为支线人物旁观、提供线索，在《甘草之味》中，则是作为旁观者出现、讲述故事。文本在解读人物的同时，人物也在解读着文本，这样“双向解读”的设计让“董仙生”的形象显得更加立体饱满、真实可信。小说的叙事视角也得以从狭隘的一人一事中跳脱出来，对接到更广阔的时间空间。于是，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名义上是游记，细读起来确是“人间”。

然而，在文本与人物的双向解读中，“董仙生”的真实性却遇到挑战，因为在他身上始终存在一种作者主观之外的自相矛盾。在“董仙生”这一人物设计之初，作者有其贴上“自相矛盾”标签的主观故意，然而在人物的塑造过程中，“董仙生”身上自相矛盾的客观存在却压倒了一切主观故意，呈现了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董仙生”



形象收拢与整合的困难中。比如，在《丹麦奶糖》《走失的人》《嗨咯》这三篇颇具代表性的小说中，由于缺乏足够的铺垫和信息，我们很难将其中三个不同的“董仙生”视为同一个“董仙生”，因为他的生平经历在其中不够完整，他的性格转变在其中也不够清晰，作为同一形象的“董仙生”显得有些破碎。孤立的“人物复现”缺乏人物内的一致性和外部场景的连贯性，文本与人物的双向解读在此时显

现了较为尖锐的割裂。对此，作者可能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会在小说中，有意通过勾连人物行为内在逻辑的方式，发掘“董仙生”们同一的精神特质，尽力弥合这种割裂感，并在叙事细节中不断加入个性化经验，在修磨“董仙生”边角的同时不断延伸他的叙事边界。这大概也就是我们会在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这篇命名了小说集，却是唯一一篇没有出现过“董仙生”的小说里，读出更加浓郁的“董仙生”味道的缘由。

从《高老头》中涉世未深的穷学生开始，拉斯蒂涅一路经历了《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等多篇小说，直到在《贝姨》中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野心家。他的成长、成型贯穿了整个《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在对他的画像中，完成了一幅绵延深刻的巴黎浮世绘。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完成了对“董仙生”的人物画像吗？大概是的，又不是。在“董系小说”当前的叙事维度中，刘建东已经为他的“董仙生”完成了格列佛程度的轮廓勾勒。然而在“董仙生”面部的皱纹、神情、光线等等诸多细节之中，依然存在施展画笔的巨大空间，小说集和“董仙生”的双向解读依然有继续发掘的阐释可能。笔者相信，当刘建东能够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将“董仙生”置于更加广阔的当代史中观察、临摹时，“董仙生”将会从格列佛继续出发，并最终成为刘建东自己的“拉斯蒂涅”。